



□本报记者 匡丽娜 李珩

6月13日,由重庆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爱卫办和市文明办联合制定的《重庆市民健康公约》正式发布。其中,提到了“分餐公筷拒野味”。

事实上,如何把好舌尖安全,避免“病从口入”,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。今年3月,市商务委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重庆市餐饮行业有序复工复产工作指南》,要求给予每桌客人提供双筷位勺或公筷公勺餐具,防止交叉污染。

各类餐饮企业这样执行了吗?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,公筷公勺、分餐制会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吗?推行公筷公勺和分餐制有什么困难,相关专家有什么好的建议?连日来,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走访。

餐企态度不一 中小餐饮企业:担心人工成本提高

6月13日中午,记者来到渝北区冉家坝一家品牌连锁餐厅,一进门就看到店堂收银台张贴着“一菜一公筷,一汤一公勺”的宣传画。

在包间内,服务员将一道主菜端上桌,并在菜品旁边摆放好一双木筷和一把不锈钢小勺,提醒用餐客人,“这是本道菜的公筷和公勺,请大家慢用。”

据该餐厅值班经理介绍,他们餐厅主打精致川菜,一直向客人提供公筷公勺和分餐服务。餐厅恢复营业后,餐厅对所有员工进行了培训,要求服务员须主动引导客人使用公筷公勺。

在北滨路一家火锅店,记者看到每张桌子的正中央都摆放着一双公筷,其颜色和普通筷子有所区别,长度也比普通筷子约长3厘米。

然而,在渝中区大坪、江北区观音桥、沙坪坝三峡广场等商圈,记者走访了20多家中小型餐馆,却发现无论是公筷公勺的配备,还是相关的服务都还有待完善。

“哪有这么讲究?大家都是这么吃的。”一位餐馆老板告诉记者,如果遇到顾客要求提供公筷的,他们会提供消毒的筷子,但一般不会主动配备。

“配备公筷公勺和分餐制会增加服务成本。”一家有10多张餐桌的餐馆老板称,“质量较好的不锈钢勺子10多元一把,我们有10多张桌子,每一桌客人大概点10个菜,配备10把公勺,成本大概一两千元。”

“分餐制的成本则更高。”一餐馆老板直言不讳地说,如果采用一人一客的“位上菜”,人工成本则大幅上升;如果是普通的大盘菜,由服务员分到每位顾客盘中,那基本得按一到两桌配1名服务员这样的比例雇人。

难过情感关 市民:“感觉大家都不亲热了”

那市民对公筷分餐制是什么态度?连日来,记者随机调查了50名市民,其中七成市民认为“太麻烦”“不习惯”,三成市民虽然表示赞同实行公筷公勺,但却坦言,在实际生活中难以执行。

“有时吃着吃着,就把公筷和自己的筷子弄混了。要用公筷就得放下自己的筷子,夹菜后又把公筷放回去,再拿起自己的筷子夹着吃,太麻烦。”40岁的陈鹏经常在外吃饭,对公筷公勺和分餐制很不以为然,他认为使用公筷公勺麻烦,也很不自然。

“我赞同使用公筷,但执行起来却很难。”36岁的李梅说,前段时间,她曾在家里摆过公筷,4岁儿子觉得新鲜,但在父母眼里,却认为她小瞧大做,甚至质问:“你是把我们当外人,还是怕我们带细菌?”她只得赶紧把公筷公勺收起来,在家再也不提使用公筷公勺了。她总结原因,“使用公筷公勺缺少亲情感。”

“公筷用起来好生分哟,感觉见外得很。”市民张国华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,他称,长久以来,中华民族的饮食方式是合餐制,讲究的是围聚一桌,觥筹交错,其乐融融。并且,一家人吃饭的时候,父母或者祖父母用自己的筷子给孩子夹菜,是表达关爱的一种传统方式。小辈对长辈、朋友间亦是如此。如果在外面和朋友聚餐时使用公筷,“感觉大家都不亲热了,很有疏离感”。



开栏语

6月13日,《重庆市民健康公约》正式公布,向广大市民发出分餐公筷、控盐减糖等倡议。我市积极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,涉及人居环境、饮食习惯、社会心理健康、公共卫生设施等多个方面。即日起,本报围绕爱国卫生运动的相关内容,推出“爱国卫生运动 共享健康生活”系列报道,以推进城乡环境整治,完善公共卫生设施,推广文明健康生活习惯,提倡文明健康、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。

钟南山呼吁

家庭用餐
也应使用公筷

公开报道资料显示,早在10多年前钟南山院士就呼吁过,在家庭中也要使用公筷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,钟南山院士向公众详解家庭卫生消毒重点时,也强调家庭用餐应使用公筷。
据《广州日报》

我国分餐制历史悠久 专家:倡导公筷分餐实际上是回归传统

“有人担心,倡议分餐制、推广公筷公勺,是不是在颠覆传统饮食文化。其实,中国的分餐制历史悠久,倡导公筷分餐实际上是回归传统。”西南大学教授蓝勇称,据记载,在唐朝以前,分餐制是普遍存在的。古语“席地而坐、分案而食”就是分餐制的生动写照。

他称,那时,古人往往席地而坐,吃饭的时候,矮矮的几、案(低桌),中间有盛食物的鼎类,可由仆人分到每人几、案上的器皿中,也可自取。考古学家发现,追溯到龙山文化时期,那时候人们就用一种名叫小食案的物品来分餐吃饭。宋以后的围桌合餐制让共餐私筷流行。原因有两个:其一是椅子的出现,其二是人们生活受到游牧民族一起吃饭的影响,纷纷效仿。等到了元朝,君主推崇围桌合餐制,围桌合餐制也就更加普遍了。

“多人就餐时使用公筷公勺有利于切断多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,是一种值得倡导的良好卫生习惯和用餐礼仪。”市健康教育所健康传播部负责人郭田称,就新冠病毒来说,唾液是主要的传播途径。此外,常见的流行性感冒、各种细菌性肝炎、水痘、手足口病等都可以通过唾液传播,并通过筷、勺在各碗盆之间流转,一起就餐者都有被感染的风险。

“使用公筷公勺,不仅是防止别人把病传染给自己,还能防止可能的疾病从自己身上传染出去。”郭田称,一家三口中,有人有幽门螺杆菌,只要患者使用公筷,即可切断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。

让餐桌文明 成新“食”尚

业内人士:分类实施,加大宣传

“要让全民使用公筷公勺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情,而是要从现在开始,从点滴做起,从宣传到行动、从饭店到家庭,从教育到践行一步步实施起来。相关部门要做更多的专题宣传,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校园、进餐馆等,帮助公众逐步养成这种意识。只有习惯养成了,公筷公勺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。”重庆一餐饮企业负责人说。

“推广公筷公勺要形成制度,从而规范餐饮企业的行为。”市工商联(总商会)餐饮商会相关负责人称,市工商联(总商会)餐饮商会发起“使用公筷公勺·文明就餐”的倡议要求:全市餐饮企业要主动为用餐者提供公筷公勺;设置提示牌和宣传语,服务人员温馨提示和引导用餐者使用公筷公勺,引导市民逐渐形成文明用餐意识。

“推广公筷公勺可以分类实施。”重庆市餐饮行业协会名誉会长刘英称,如今,市内许多大型高档餐馆都实行了公筷公勺或分餐制,他们对公筷公勺的尺寸、外形稍微做了一定改变,方便顾客使用。中小型的餐馆或者大排档,可以采用公勺的办法,每道菜里放上一把公勺,提醒顾客养成文明餐饮习惯。

市民王德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,推广公筷公勺时,可以在品质和文化创意上下点功夫,专门开发公筷公勺产品,让市民乐于使用。

从简单清扫卫生到共享健康新生活 ——重庆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历程

□本报记者 匡丽娜 李珩

“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一项创举,反映了中国卫生工作的鲜明特色。”日前,原市爱卫办主任、从事爱卫工作30多年的何爱华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,经过68年的发展,爱国卫生运动内涵已极大丰富,不再是简单的清扫卫生。

从1952年开始,重庆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,城乡卫生状况持续改善。如今,重庆的爱国卫生运动又有哪些变化,记者由此走访了市卫生健康委和重庆图书馆的专家。

历史:山城曾暴发大规模霍乱

“新中国建立前,全国的卫生条件十分有限,人口死亡率在千分之二十五,人口平均寿命约为35岁。”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拿出一叠厚厚的资料介绍,1945年,重庆城内曾爆发大规模的霍乱,造成当地“千人死亡,棺材售罄”的痛心局面。而在1950年至1953年的4年中,白喉、疟疾与麻疹三种疾病也曾在山城暴发。

根据《重庆市卫生志》的记录,1950年至1953年,山城共有235771人患上各式各样的传染病。其中身患疟疾的共有154369人,占患病人口总数的76.23%。

由于当时教育水平落后,市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,封建迷信的思想根深蒂固。重庆市的《第六卫生事务所 1951年2月份工作月报》记录了这样一个事例:重庆市金马地区的李九娃出了传染性极强的麻疹,但是在防疫员登门访视时,却因为要“忌生人”而躲藏起来不见面。

“与此同时,当时全国的公共卫生设施也较为落后。”重庆图书馆研究员王志昆介绍,档案记载,清代和民国时期,四川城镇公厕多沿用旧习,靠墙挖坑,以席或土墙、夹壁围之,坑槽上以木板或者石头作为踏板,有房顶的多为茅草棚,瓦顶较少,所以那时的厕所被称为“茅(毛)房”或“官茅(毛)司”。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重庆个别地方才修建了少数近代公厕。随着下水道的兴建,重庆市城区才修建了水冲厕所。

“市中区中山公园(现人民公园)有一所砖墙、水泥坑槽、磨石地面和蹲位的水冲式公厕,雇有专人看管及清洁,进厕所须付钱,由看管人给一张手纸。一般公厕只是每天清晨有人清洁而无人看管收费,卫生状况很差。”王志昆说。

发展:“除四害”全民参与行动

“为了消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

疾病,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把除害灭病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。”原市爱卫办专职副主任徐世璋介绍,1952年全国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,把“卫生工作与群众性卫生运动相结合”定为卫生工作的一项原则,随后全国各地都逐级建立了爱国卫生委员会。

“重庆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如火如茶开展。”徐世璋介绍,1950年3月25日,重庆市卫生委员会成立,全市98.6%的地区和单位建立起卫生防疫组织,形成了卫生防疫网络。1952年10月,重庆市卫生委员会更名为重庆市卫生防疫委员会,并于1953年3月,更名为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。

“那时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热潮。”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副主任袁佳红介绍,1960年9月,原邮电部发行了特43《爱国卫生运动》特种邮票1套5枚,其主图分别为“厂矿卫生”“除四害”“讲卫生”“预防疾病”“锻炼身体”。

袁佳红解释,“‘除四害’活动是当时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。”她称,《四川省志·医药卫生志》中记载,1956年至1957年,重庆市进行了鼠类抽样调查,发现有黄胸鼠等13种,市中区以褐鼠为最多。为了灭鼠,全市抽调了数十名卫生、工程技术人员,按市、区、街道办事处逐级进行技术训练,各



街道、基层单位等纷纷利用报告会、誓师会、展览会、座谈会、黑板报、广播、演唱、标语、漫画等方式宣传老鼠的危害和灭鼠的方法,并发动了95%以上的群众积极参加灭鼠。

如今:五大行动助推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开展

实际上,重庆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。

今年3月,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,明确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,大力改善人居环境,培养健康饮食习惯,完善公共卫生设

施,提倡文明健康、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。“今年的爱国卫生运动确定了‘防疫有我,爱卫同行’爱卫月,‘灭蚊阻疫’病媒生物防制、控烟、卫生创建、健康知识普及行动等五大行动。”市卫生健康委爱卫处处长李彤说。

“爱国卫生运动需要人人关注、人人参与、人人共享、同向同行。”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、主任黄明会表示,为了进一步推动爱国卫生运动,重庆将加大宣传推动,采取“线上+线下”方式,普及疫情防控、疾病预防和健康生活等知识,让群众以“主角”姿态,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爱国卫生运动中来。

六月十二日,以防疫有我·爱卫同行」为主题的爱国卫生志愿服务活动在永川区举行。
通讯员 陈仕川 张玲 摄影 重庆